

“东亚战时动员的相位——冲击与遗产” 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高士华

2019年10月13日,由日本日中关系史研究会、早稻田大学东亚国际关系研究所、新学术领域研究“和解学的创成”、早稻田大学国际和解学研究所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东亚战时动员的相位——冲击与遗产”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早稻田大学召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等16位国内学人与会。

这次研讨会日方很重视,由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主任波多野澄雄,信州大学人文学部特任教授久保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教授、新学术领域研究“和解学的创成”负责人浅野丰美,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教授、东亚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杰,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副教授中村元哉组成了筹备委员会。为了更充分地准备,原定9月召开的研讨会经日方提议改在10月12—13日召开。

中方也根据王建朗指示,进行了积极准备,《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负责具体筹办工作。原定两天的研讨会由于超强台风的影响改为只在10月13日一天进行。

研讨会首先由王建朗研究员致开幕辞。王建朗充分肯定了会议的筹备工作,指出参会论文主题集中,涵盖了中日战争时期以及战后一个时段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动员的方方面面,反映了抗战史学界最新的研究动态;参会人员以年轻人为主体,涵盖各个年龄层,希望全体与会人员能在会议中充分交流、探讨,增进中日双方的学术互动。浅野丰美代表日方致辞,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学者。共有70多人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后,久保亨、杨奎松作了主题演讲。主题演讲后,研讨会分组进行,气氛热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以下做一具体介绍。

一、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战争动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群众组织有什么用——1944年的一场争论》指出,抗战时期,群众路线成为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群众组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推手。抗战初期,群众组织帮助中共迅速打开局面,创建、发展根据地;抗战中期,配合党和政权推动根据地各项工作向深入发展;抗战后期,随着中共控制力的不断增强,群众组织地位逐渐下降,党的一元化领导和众多的群众组织不无扞格。1944年,陕甘宁根据地围绕着是否需要保留群众组织展开过一次讨论,毛泽

东也在事后有或明或暗的表态。争论的结果，群众组织并未被取消，1949年后，还曾一度成为历史风云中的主导者。其间可以看到群众及群众组织在中共革命中始终具有的张力。

陕西师范大学黄正林的《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战时全面动员》，讨论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战时动员，指出在抗战初期，中共战争动员的目标是激发农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促使农民很快理解和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在抗战最困难时期，中共启动了新的动员模式，把一个由士绅阶层控制的乡村社会改造成现代乡村社会。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金伯文《〈论持久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阅读与接受》一文指出，如何动员军民应对抗日战争，并在战争中成长壮大，是中共高层最为关注的问题，其中，《论持久战》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它所做出的极具前瞻性与全局性的战略判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高级干部多被要求自修并深入研习《论持久战》，下级干部一般通过教材与课程的学习了解《论持久战》，书中核心思想作为课程内容被“简化”，融入到教材与讲授之中。在基层兵民教育中，《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被进一步“简化”，成为民族意识教育、政治常识与文化知识学习的一部分。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宋弘的《“灭敌人耳目”：抗战时期中共的打狗运动》，研究了战时中共华北根据地开展的打狗运动，梳理了打狗运动的缘起、民众动员的过程、打狗手段及对狗的处理。指出在打狗运动中，最困难的工作是如何说服民众接受打狗，面对民众一系列不情愿的行为，中共采取多种路径做民众的思想工作，尽管在中共的民众动员中也存在着“强制性动员”的情况，但仍然是以“说服性动员”为主，体现了战时中共民众动员的特质。

二、国民政府的抗战动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姜涛的《备战：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兵役制的出台与实施》，指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部即正式开始订立兵役法的程序，1933年6月颁布的兵役法是结合各类意见后以征兵制为核心，兼采民兵制、保留募兵制的混合兵役法。1936年5月，国民政府在一部分地区试行征兵，但效果有限。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募兵仍在多数地区实行，成为国军兵员的重要来源。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高翔的《蒋介石与全面抗战前中国军事工业建设》，认为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对军事工业的关注重点放在经营中央兵工厂和接收地方兵工厂。之后，蒋介石重点寻求中德军事工业合作、兴建新式兵工厂和接收地方兵工厂。他邀请德国名将塞克特出任军事总顾问，拟定了《中国军备工业之建设计划》，以此作为中国建设完备军事工业的基本蓝图。由于中德军事合作工业建设的款项仅能兴建一座炮弹工厂，加之七七事变后不久德国即中止与中国合作，最终成果寥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潘晓霞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现金移运》，指出1937年前，面对有可能爆发的大规模中日战争，国民政府已经展开财政动员。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紧急部署从华北撤出现钞。同时，国民政府从沿海地区向内地集中现金。除此以外，国民政府还组织了现银外运，即将内地现银运往香港，乃至美国。大规模的现金内运和外运，使中国金融在全面战争爆发后，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损失，形成战争初期财政坚固和外汇稳定的状态。

南京理工大学陈钊的《派系对峙与战时国立联合大学的命运——以西北联合大学为中心》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后，教育部采取联合大学的形式将北平、天津主要大学内迁西安、长沙，以使其能继续办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合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加上中央研究院部分力量，合组国立长沙

临时大学(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部如此分组的背后,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国立大学间所谓英美派、法日派对峙实情的迁就。两派系的对峙也影响到了战后大学复员。抗战胜利后,英美系利用蒋介石对原北平大学后台李石曾的不满,成功地把原北平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并使之永留西安,两派系在对峙 20 年后,以英美系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浙江师范大学王荣华的《战时粮食动员与粮食部对重庆机制面粉业的管控》指出,从 1941 年起面粉原料采购困难,重庆的面粉厂成立四厂联合办事处,以遵行政府法令、平定麦价、积储面粉原料为宗旨,使生产得以继续。7 月 1 日粮食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力图使各面粉厂置于粮食部、财政部控制下的同业公会等组织管制之中。1942 年 3 月,国民政府派员至重庆各面粉厂,饬令迅即组织成立面粉工业同业公会。欲结成联盟以求自治自保的各面粉厂,最后被纳入政府部门严密管控之中。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研究员藤井元博的《中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建设:美国·内战·动员(1942—1945)》一文,认为蒋介石等人并不完全接受美军所要求的改革,而是在保持本军独立性的同时构筑“建军的基础”。中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推进的军事建设,一方面在北伐以来国民政府着力的军事编制改革和引入外国顾问团等改革的延长线上;另一方面,通过美军支援进行的“建军”,国民政府也为战后军事建设和与中共的对决做了准备。

三、日占区的战争动员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吴婉惠的《糖衣下的炮弹:日军宣抚班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战争宣传》认为,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对占领区民众的宣传,成为宣抚班的重要工作。宣抚班希望通过宣传控制沦陷区人民的思想,制造有利于日本的舆论基础,以此维护和巩固日军在沦陷区的统治。日本相信通过有意识的思想宣传,能达到树立日军的“文明”形象、清除国民党和共产党影响、营造亲日氛围、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秩序的目的。宣抚班的战争宣传依赖于日本的军事力量,由于宣传内容与其军事行动、殖民掠夺相矛盾,不可能有显著效果。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谢任《庆典中的政治: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与中国沦陷区》指出,1940 年的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在日本国内、台湾和朝鲜等殖民地、伪满洲国以及 1937 年全面抗战之后的中国沦陷区都有反响,但不同地区表现出的差异性也同样明显。在汪伪的沦陷区,庆典没有起到发挥战争动员与刺激经济的作用,而是变成了展示日伪关系的政治表演。

日本明治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圣东的《伪满军中的日系军官:“独立国家”与“大陆的弃子”》,集中讨论了伪满军中日系军官的战前战后经历。伪满采取所谓“独立国家”的形式,而日本人又是所谓五族之一,因此从理论上使日本人可以持有伪满军的军籍。因为军籍的不同,日系军官在战后不能得到和一般退伍军人同样的待遇,他们曾经是日本侵略大陆的“尖兵”,战后又被其政府抛弃。

日本大阪大学研究生院助教邹灿的《中日战争与台湾的精神动员:兼论与日本本土的比较》指出,中日战争爆发后,台湾社会的民心出现了明显的动摇。此时,恰逢日本政府要求在台湾岛内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该运动便以推动皇民化运动战时化的形式进行。其着重于增强台湾人皇国民意识和发扬日本精神,较之本土的精神动员,战时色彩初期相对薄弱,之后逐渐浓厚。

四、动员的遗产:从战时到战后

久保亨的《从战时到战后——东亚总体战体制的形成与演变》认为,日本国内,为发动侵略战

争而采取了构建战时经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策,这些政策影响到殖民地。而在中国,则为抵抗侵略而建立起战时经济体制,动员国民。二战结束后,日本的战时计划和统制体系被应用于战后重建,在战时经济体制解除后依然发挥影响。在中国,战时统制经济曾暂时中断,而后再度复活,后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又为构建强有力的战时体制而选择了彻底实行计划经济的道路。

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的《敌后中共农村基层干部群像——以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山西太南农村基层干部为例》,讨论了山西太南农村干部在抗战前后的状况。中共在太南,从县到区到村,为了推进工作,防止基层干部滥权、腐化,尽可能选派受教育程度高,并有过政治斗争历炼的干部来充任党政领导。进而按照中共党、政、工、青、少和民兵的系统,分别将农民组织起来,定期学习、训练并参加实战。从长治县1943—1944年重建党组织的情况看,县长级干部学历最高,区长级其次,村党支部书记级最低。这里的选任明显是受中共干部总体的教育程度和当时可选干部的范围局限的,但其特点依旧十分明显,即除政治素质外,干部权责越重,对教育程度的要求越高,家庭出身及个人阶级成分基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日本爱知大学博士研究生刘黎的《和解与协力:从国防部第三研究组的战后工作考察国民政府对日本人留用的动员》指出,1946年9月至1949年5月,国民政府为拟定第三次世界大战对策,召集具有留学日本经历的军官,创设了保密组织“第三研究组”。该组织留用土居明夫、辻政信等一批原日军军人,开展第三次世界大战作战对策制定、对苏联情报收集等工作。另一方面,第三研究组通过国民政府驻东京代表团的渠道,从日本国内召集了山本敏等原日军军人,筹建国民政府情报学校,帮助蒋介石政府培训情报人员。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鄢海亮的《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1945—1947)》,以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盛行的“重庆人”与“上海人”两个特有名词为观察对象,探究复员语境下复员人员与收复区人民是如何被制造对立的。这两个特有名词,既是一种地域概念,更是一种政治概念。前者备受尊崇,后者则有低人一等之嫌。战后的惩奸运动则将二者的冲突与对立推向高潮,两者间隔阂日深,其结果是“上海人”被看作“他者”而不具备享受胜利的资格,“重庆人”则失去了收复区的人心,国民党统治在隔阂与对立中加速了灭亡。

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研究生周俊《中共的南下动员与战时秩序的连锁(1948—1949年)——华北地区的农村与城市的比较》认为动员是理解中共革命的关键词,分别讨论了华北农村及北平市南下动员问题。指出华北农村劳动力及粮食不足的社会条件,以及代耕制度的运转不良都对南下动员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中共极富弹性的动员机制最终确保了华北农村南下动员任务的完成。而在物价高涨、失业人员众多的北平市,参加南下的主要是面临就业问题的大学生及无业青年。总体而言,北平市的南下动员较为顺利。

日本上智大学教授笛川裕史作了《中国复员兵的战后体验——以上海为例》的报告。1949年以后,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士兵复原潮,从1950年至1958年9年间复原人数多达493万。他们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左右中国命运的中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朝鲜战争,他们是东亚战时动员“冲击与遗产”的一部分。这些复原士兵被国家塑造成楷模,也被大众所尊敬,但他们大多在现实中不得不面对各种苦恼,文化水平低等问题也使他们难以适应社会。

日本菲利斯女子学院大学副教授泉谷阳子的《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以河南省许昌专区为例》指出,1950年6月30日公布的《土地改革法》明确要求保护富农经济,讨论最多的就是富农问题。毛泽东主张不动富农的土地,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乱打乱杀”的极左倾向,维护统一战线。近年来,随着对土地改革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质疑“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贫苦农民的支持,从而获取了内战的胜利”这种简单的结论,但是完全忽略土地改革因素也是有问

题的。

日本台湾学会会员森田健嗣的《关于日本对台湾战后处理的政策》认为,研究日本对台战后处理的问题,不仅需要留意日本国内,还要注意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应对。日本对台湾战后处理之所以停滞不前,不仅是因为日本国内的问题,还在于台湾方面的消极应付。戒严令下国民党一党统治时期,对此积极发声的群体不是来自政府执政党系统,而是来自民间,且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

全部参会论文报告完毕后,进入综合讨论环节。刘杰教授和《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研究员作为主持人,对这次讨论会作了总结。高士华对波多野澄雄、刘杰等为讨论会顺利进行所做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希望今后中日两国抗战史学界进行持续不断的深入交流。波多野澄雄先生表示,此次会议尽管因台风的关系,议程被迫压缩,但是有事先阅读论文的准备,会议中的讨论相当深入,达到了交流的目的。

由于台风的影响,有三位日本学者没能赶来参会,他们是广岛大学教授丸田孝志、昭和女子大学副教授松田忍、早稻田大学讲师岛田大辅。

丸田孝志的《战后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冀鲁豫根据地的军事动员和农村社会》指出,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中共也不断变换敌人与同盟者,中共政策方针的转变,是为了应对难以预测的形势变化。中共的群众路线,一贯保持了将下层大众作为积极分子、党员、干部加以使用的指向。这种指向性,在运动中,给社会赋予了流动性。其政治等级划分与动员手法,被 1949 年后的中国所继承。

松田忍《日本战时动员的方法性特质——关于 20 年代至 50 年代的“生活”》指出,生活的刷新,是日本战时动员体制的关键所在。更新人们的人生观与幸福观也是实现动员的一种方法,在动员中人们的生活不是“作为权利的生活”,而是一种“作为义务的生活”。从战败至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伴随着日本的战后复兴,最终得到了日本国民的广泛支持。

岛田大辅的《对华新政策与太田宇之助——以江苏省经济顾问时期的米粮、田赋政策为中心》,对太田宇之助的中国认识进行了重新探讨。太田 1943 年 4 月开始担任汪伪政府的江苏省经济顾问,协助陆军和汪伪政权。岛田大辅认为,太田个人的真实意图是帮助建成非傀儡性质的自主独立政权,平息和重庆蒋介石政权的争端,最终实现所谓的“全面和平”。

为了准备这次讨论会,日方以 40 岁以下学人为对象进行了征文,结果选用了 4 篇在日华人学人(张圣东、刘黎、邹灿、周俊)和 3 篇日本学人(森田健嗣、岛田大辅、藤井元博)的论文,这一方面说明了在日华人学人的成长,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的抗日战争研究需要有更多的日本年轻学人参加。抗日战争的研究,不仅需要我们努力推进,也需要日本在内的国际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日本的抗日战争研究,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相对中国抗日战争学界,日本的战争动员研究,涉及东亚和东南亚等更为广大的地域,强调其历史连续性,值得我们注意和参考。

[作者高士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莹莹)

The CPC's Responses to the Betrayal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adres in North China Resistance Base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Yang Dong, Li Gelin (51)

The cruelt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is well known, so it is inevitable for any Party to have a minority of defectors and traitors. However, the betrayal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in the North China Base Areas of the CPC showed different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regions and groups. The defections of a small number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to the enemy were, of course, incompatible with the disciplinary requirements of the Communists and even contrary to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mmunists. Therefore, the CPC paid great attentions to the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the defectors. In the contradiction and entanglement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defecting to enemy" was almost the expression of mutual recriminations of both sides. The Kuomintang accused the CPC from the angle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s rule, while the CPC refuted i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Because the CPC timely made correct contingency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deal with problems, the defection of a few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in the North China Base Areas did not affe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PC's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CPC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werful unde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spirit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Kuomintang's Works of Arming Civilians in Guangdong under "Military-Civilian Cooper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Guangdong People's Anti-Japan and Self-defense Corps Li Hao (68)

"Showa Trading Company"—A Company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Japanese Army during the War Guo Xunchun (80)

"War! There is War Everywhere!"—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n Goebbels Diary Peter Harmsen (93)

The complete diary of Joseph Goebbels, the Nazi German Propaganda Minister, was only used by historians in recent years. Previous important articles and books on German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have failed to use this historical material.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problem: to what extent the pub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in Goebbels diary will correct the past views about the extent of Germany's involvement in the Far East crisis. The article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itler's role in decision-making in 1937, and gives concrete evidence that the German dictator turned to pro-Japanese position, which was actually earlier than previous speculation. In addition, Goebbels diary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Hitler's view of East Asia by Nazi ideology was perhaps far more beyond previous estimates.

Paper and War: Paper Shortage and the Social Responses in Sichuan during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u Xuming (103)

The Studies on Opium Invasion Policies in the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after the War Wang Meiping (120)

Commentary on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by Arthur N. Young Wu Jingping (132)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War Mobilization and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en Yan (138)

A Summary of the Sino-Japanes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rtime Mobilization in East Asian—Impact and Heritage" Gao Shihua (142)

A Summary of "The Fourth High-level Forum on the Study of the Great Rear Area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Gao Xiaobo (147)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Studi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for Seventy Years" Zhang Yan, Yan Yong (152)

General Table of Contents, *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2019* (157)